

## 淺談唐人的綠色環保意識

羅永生

公元六五四年閏五月三日晚上八時過後，一名中年皇宮衛士，爬上了皇帝寢殿的門檻上，大聲呼喊。他並不是發現了刺客，而是警告洪水將快淹至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洪水瞬眼間已經湧入宮殿，皇帝幸好得到警告，逃到一個較高地方，得免於難。不過這次水災死亡的居民及當番衛士，仍然有三千餘人。皇帝對這位日後成爲將軍的衛士留下深刻印象，除了將御馬一匹爲賞外，日後還赦了犯軍法的該將軍一命。死裡逃生的皇帝是唐高宗，救他一命的，則是日後成爲民間小說中的英雄人物薛仁貴。

這件事情驟看似是天災，但部份也可能是人禍。事情並不是發生在長安城中，而是在位於首都鳳翔府東北約一百五十里，原名九成宮的萬年宮。這個宮殿爲皇帝避暑用，最初在隋文帝時期由楊素監督建造，傳說由於苦役過甚，不少工人死亡，至晚上往往在宮附近不但烽火瀰漫，而且傳出哭聲，直至隋文帝以酒奠祭後才告消失。後來唐太宗又告重修。正可能是因爲修築宮殿關係，水土大量流失，唐高宗遇險時似乎只下了一日雨，便弄成水災，可見附近採伐過度，環境遭受嚴重破壞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古代官員在水災時常主張去奢從儉，減工役之費，雖然往往給人的印象，是循例以儒家治政思想作個公式化的政治表演，實際上卻不無起到減少人爲災患的作用。

如果說所謂建設對環境有不良影響，古今皆然，則奢侈浪費的行爲造成的生態破壞，同樣可以見於史籍。隋唐時期有不少統治階級爲了本身享受，往往不惜一切，以求與眾不同。隋煬帝的奢侈，早已聞名。史載他爲了修飾本身巡幸的車馬，向天下州縣徵取各種奇珍異物，特別是「骨角齒牙，皮革毛羽」一類，說當時「水陸禽獸殆盡」，或許誇張，不過說當時一些珍禽異獸，例如翟雉和白鷺鮮的價格暴漲，大概並非過言，唐高祖在立國不足一年便下了一道罷貢異物詔，與此也不無關係。但不足一個世紀之後，類似的情形又再度出現。唐高宗的孫女安樂公主利用各種不同鳥類的羽毛，織成兩條毛裙，「正看爲一色，旁看爲一色，日中爲一色，影中爲一色；百鳥之狀，並見裙中。」大概這條別創一格的裙子風靡一時，她又利用獸毛，按照動物本身形狀做馬鞍蓋子，而她母親韋后亦不甘後人，但用的是鳥毛，韋后的妹妹則做了豹頭枕、伏熊枕等爲迷信之用，從名字看來大概也是用動物爲材料。總之，韋后母女家人成爲使用動物製利品潮流的領導人物，倒楣的卻是中國南方的雀獸：「江嶺奇禽，異獸毛羽，採之殆盡。」這也是後來玄宗朝初，以姚崇、宋璟等人爲首的朝廷，極力推崇儉樸的原因之一，史載自此之後，「採捕漸息」，他們的主張，可說間接保護了奇珍禽異獸免於絕種。但未知是否這個原因，九世紀初的元和九年時，出現了官員捕養狐兔去提供貢物的情形，不過最後亦被朝廷命令禁止。（《冊府元龜》160）

姚崇、宋璟等開元名臣，如果有今日的所謂環保意識的話，主要原因，相信是他們開始注意到京師地區由於過去開發過盛，木材開始短缺。秦始皇建造阿房宮的時候，曾經從楚、

蜀大量採伐木材，東漢的豪族，也用江南的楠木作棺材。隋文帝之後，皇室宮殿多建於洛陽，而隋煬帝建東都和武則天修明堂的木材，都是來自江南，相信不單是因為特殊需要，更是因為關中缺木。事實上，相對中原未開發的閩西寧化在隋末唐初，已經有人“開山伐木，泛筏于吳，居奇獲贏”（《同治寧化縣志》卷一建邑志），相信與隋煬帝時代的大事建設，影響全國。唐代前期兩京繁榮，建設更多，需材更甚，情形自然沒有改善。例如唐朝後期德宗需要大松修神龍寺時，有人告知他京畿地區的同州山谷發現數千株八十尺大樹，他卻不予置信，因為在他的認識中，開元、天寶期間在京師一帶已找不到「美材」（《資治通鑑》350，《太平廣記》239）。他的理解，縱然或因在皇室長大的限制而可能與事實有所偏差，但說這是當時不少人的印象，卻應該不錯。長安的富人王元寶雖曾以[終]南山的樹的數目來誇耀他的家財（《太平廣記》46），但唐代京師大樹木，無疑愈來愈少，唐敬宗後來在京師造龍舟類的競渡船，要從南方輸入原木（《冊府元龜》547）。洛陽也似乎有類似情形，朱全忠為了逼唐昭宗遷都洛陽，便把長安宮殿和政府官舍以至民居的木料拆掉，運往洛陽，便可能是因為木材不足之故。

雖然一般樹木不一定可用於建造，但仍然有其他用途。長安城內街上和禁苑中的不少樹木，便在唐朝初年被唐高祖李淵下令斬掉，以換取布帛，作為政府的支出。（《冊府元龜》卷四八四）當然，不是每個皇帝都一切亂伐樹木。隋文帝時遷都時，不同意去掉舊村門的一棵大槐樹，據說是因為他父親曾在樹下休息（《舊唐書》37），不管他是否意識到當時樹木開始稀少有關，這棵老樹得以保存至唐朝，為人所知，成為佳話，可見唐代京師內外雖然有大量槐樹 - 白居易給張籍的詩中，就曾有「迢迢青槐樹，相去八九坊」之句 - 但老樹或許不多。唐朝官員中最有名的堅持綠化官員，大概是德宗時的渭南縣尉張造。由於「取材不易」，當時政府有意斫取由長安通往洛陽這修官道上的槐樹來造車。張造接到命令後，並不同意，他回了一封文書，指出這些「東西列植、南北成行」的樹木曾經造福不少人，他把高祖和玄宗與這些樹的關係搬出來作為保存它們的理由，但他的主要論點，其實在於「拔本塞源，雖有一時之利；深根固蒂，須存百代之規」。這些樹因此得以保存下來，張造後來亦調任京官。（『唐國史補』上）

張造的事蹟有一點值得注意的，是朝廷在主張把槐樹斫取的同時，未忘「更栽小樹」，從中可見，植樹在多數官員心中，還是理所當然的。事實上，隋唐中央政府中尚書省下工部中有虞部，其中的一門工作，便是專負責掌京城街巷種植，不過大概他們官位不高，人數有限，權威不足，因此出現了其他官員過問其事務的情形。開元末年，兩京道路並種果樹的命令，便由專使負責。到了和張造任渭南縣尉差不多同時的貞元年間，又有京兆尹不同意有關官員以榆樹去補足官街樹缺的意見，而主張種槐樹的例子。（《唐會要》86）

毋庸諱言，重視植樹並非始於唐朝，不過唐朝的確可以找到十分多的例子，去說明當時人如何重視植樹。柳宗元所寫的《種樹郭橐駝傳》為人熟知，這雖然是借題發揮其政治見解的文章，但文中的主角，一位精於植樹技術的駝背老人，相信不是無中生有而實有所本，透過他的生活可以看到當時京師植樹的發展。柳宗元能夠找到這一題材去發揮他的時事觀，應

該與他本身亦酷好花木果樹有密切關係。他被貶永州後，在茅檐下栽竹，在屋前植靈壽木，一一以詩紀事，雅興不淺。他到了柳州任刺史後，栽柑城隅，規模更大：「手種黃柑二百株」（《柳州城西北隅種柑樹》）。

除了柳宗元以外，唐朝其餘為人熟悉的愛樹官員，尚有在長安時「十載事樵牧」（《孟夏思渭材舊居寄舍弟》）、在洛陽時「栽松滿後院，種柳蔭前墀」（《春葺新居》）的白居易有傳說他在杭州時，凡犯法者必得先在西湖邊栽三樹，始行判刑。若真有其事，或許可以視為現代以社會服務作為一種刑罰的先驅。李賀有《莫種樹》的詩，句謂："園中莫種樹，種樹四時愁"，詩人因見到樹的四時榮枯而希望不必種樹，只反証了當時植樹的普篇。宋朝初年把勸課栽植作為官吏考績的內容之一（《宋大詔令集》183），或許正是受到唐朝這種愛護自然傳統的影響。但唐朝植樹的不只是官吏，也包括百姓。《酉陽雜俎續集》卷二便記載了驛西的百姓王申，手植榆於路傍成林，夏天還供應茶水給路人。

王申很可能是位佛教徒，正如日本學者道端良秀指出，種樹和果園是《佛說諸德福田經》所推崇的事業，是佛教的一種社會救濟事業中。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明遠，他為了防治淮與泗水的氾濫，與地方官共謀免於水害對策，洽議數植松、杉、楠、檜等數萬株，以為防治。宗教信徒植樹造福世人外，自不忘美化寺院。隋唐宗教名勝中樹林勝景特多，也是當時一大特色。唐詩中描述寺院幽靜的句子不少，王維的「古木無人徑，深山何處尋」（《過香積寺》），便是膾炙人口的名句。應該承認，寺院地點因為經過特別挑選，通常都環境秀麗，得到先天之利，例如唐高宗為母親追福而建的大慈恩寺，雖然在長安市內，亦「挾帶林泉，務盡形勝。」（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）但佛家思想中的愛生道理，相信也成為這些寺院長期能夠保存清幽，成為後世名勝的原因。慈恩寺環境雖然已經不錯，但該寺的法力上人，曾在寺中手植白牡丹、柿樹。更有趣的是殿庭的大莎羅樹，是「安西所進」（《酉陽雜俎續集》卷六），不管所進的是和尚又或外國的官方代表，外國人士顯然了解到唐代佛教寺院有植樹傳統，始會帶來這種禮物。與域外佛教關係密切的玄奘，據說往西域取經前曾在一寺院中手摩松枝，請該松在他西去時西長，而回國時則東長，後來松樹西長多年後東指，果然是玄奘回國之時，松樹亦得名摩頂松。（《獨異志》上）另外，當時的南素和尚院，庭有青桐四株，是「素之手植」。（《酉陽雜俎續集五》）這些故事，多少反映了寺院中部份樹木由僧人栽種的實際情況。寺院給人古柏森森的印象，應該不全是偶然，亦是佛道信者有意栽種的成果。

唐人不單愛植樹，也愛種花。早有學者指出唐人特別喜愛牡丹。在寺院、公署和達官貴人的宅第都可見，主要原因是牡丹代表富貴。在人人喜歡牡丹的情形下，出現移植、買賣及品種改良的現象。（參李樹桐：《唐人喜愛牡丹考》）種花在有錢人家的居宅最盛，如《酉陽雜俎續集》卷二記東都尊賢坊田令宅，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，發花千朵，但唐人喜愛的花不只牡丹，上引書卷九又記衛公平泉莊有黃辛、紫丁香、本來尚有同心蒂大芙蓉。而喜受花的人也不只達官貴人。東都敦化坊一位百姓家中有木蘭樹，色深紅，後來賣給一個觀察使看宅人，相信也是百姓。（同前引）唐朝兩都的樹木或許較過去少，但花卉數目則不但不減，

還應有增，在種類上更是如此。杜甫《陪鄭廣文游遊何將軍山林十首》之三便以從月支到來的王子比喻從中亞來的異種花。

雖然史朝中可以見到唐朝不乏愛樹惜花的記載，但總的來說，對自然生態的破壞，看來還是多於保護。大概由於洛陽賞花的狂熱，對稀有品種的需求劇增，以致當地的賣花者也發現，「嵩山深處有碧花玫瑰，而今亡矣。」(『酉陽雜俎續集』卷九) 佛教可能有重視自然的思想，但佛教本身的寺廟和其他建築，卻是需要大量木材來建成的。

隋唐之際，和今日一樣，有不少人並不愛惜自然，因為各種原因，大量浪費，引致自然環境多加破壞。但與此同時，亦有人持反對意見，主張節儉，而植樹種花，更是當時不少人的喜好。他們的動機與今日愛好自然者或許不完全一樣，他們亦不一定有今日環保運動者的危機意識，但他們間中見到合理的利用資源和保護自然的思想，與現代人的主張，卻不乏相通之處。他們的經驗，不管是正面或負面的，儘管事隔久遠，相信未全去失去參考價值。